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概况、地方志资料汇编

历史部分

咸同黔南各族农民起义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概况》编写组 编

1982·8 都匀

前　　言

国家民委于一九八〇年规划在全国编辑出版关于民族问题的五种丛书。这五种丛书是：《中国少数民族》、《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和《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其中的《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的内容是各自治地方行政区划、自然地理、民族和人口、语言文字、地区沿革、社会结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名胜古迹等情况介绍，以及自治地方在党的领导下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实现民族平等，加强民族团结、进行社会改革，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文化事业的情况和经验。编写这套丛书的目的是配合民族政策再教育，促进安定团结，调动各族人民的积极性，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做出贡献。

根据国家民委的统一规划，我州承担《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概况》一书的编写任务。为了编写好这本书，州《概况》编写组计划首先收集整理并汇编我州各方面情况的资料，第一批编印的资料汇编有历史、地理、民族三个部份，每一部份又分为若干专题分册，陆续编印。编印资料集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广泛发动群众为我州《概况》的编写提供各种资料，同时也向各级党政领导、科学工作者以及广大干部、群众征求意见，希望对资料汇编中的遗漏、错误给予补充、批评和指正。

1982年8月

前　　言

国家民委于一九八〇年规划在全国编辑出版关于民族问题的五种丛书。这五种丛书是：《中国少数民族》、《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和《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其中的《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的内容是各自治地方行政区划、自然地理、民族和人口、语言文字、地区沿革、社会结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名胜古迹等情况介绍，以及自治地方在党的领导下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实现民族平等，加强民族团结、进行社会改革，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文化事业的情况和经验。编写这套丛书的目的是配合民族政策再教育，促进安定团结，调动各族人民的积极性，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做出贡献。

根据国家民委的统一规划，我州承担《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概况》一书的编写任务。为了编写好这本书，州《概况》编写组计划首先收集整理并汇编我州各方面情况的资料，第一批编印的资料汇编有历史、地理、民族三个部份，每一部份又分为若干专题分册，陆续编印。编印资料集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广泛发动群众为我州《概况》的编写提供各种资料，同时也向各级党政领导、科学工作者以及广大干部、群众征求意见，希望对资料汇编中的遗漏、错误给予补充、批评和指正。

1982年8月

K297.32

18/5

K297.32

1/5

目 录

前言

- 1、咸同年间贵州各族农民起义简介… (1)
- 2、杨元保领导的独山布依族农民
 起义…………… (5)
- 3、柳天成领导的都匀苗族农民起义… (12)
- 4、潘新简领导的本族农民起义…………… (24)
- 5、罗光明领导的平江农民起义…………… (49)
- 6、何得胜领导的瓮安号军起义…………… (58)
- 7、潘名杰领导的贵定苗族起义…………… (71)
- 8、太平天国起义军在黔南的革命斗争 (80)
- 9、太平军克广顺，陷定番…………… (89)
- 10、太平军得失荔波城…………… (90)
- 11、瓮安榔民抗粮斗争…………… (91)
- 12、罗斛农民起义…………… (93)
- 13、都匀各路义军将领简介…………… (94)

咸同年间贵州各族农民起义简介

从一八五一年（清咸丰元年）至一八七四年（清同治十三年）的二十三年间，贵州各族农民在太平天国革命的影响和推动下，爆发了一次规模空前的各族农民大起义，历史上称为咸同贵州各族农民大起义。

在这一期间，贵州全省先后有五十多支农民起义军参加了大起义，起义农民包括了居住在贵州的汉、苗、侗、布依、水、彝、瑶、仡佬、壮、回等十多个民族一百多万人，遍布当时全省七十三个府、厅、州、县，出现了“千里苗疆，莫不响应”的形势。

从一八五一年至一八五四年，是大起义的酝酿阶段。这一阶段中全省各地爆发了一些群众性的抗粮斗争和规模较小的武装起义，如一八五一年，黔东南以高禾、九松、计七为首的武装起义，一八五三年，瓮安刘瞎么领导的榔民抗粮斗争，天柱县侗族农民的抗粮斗争，以及铜仁万山的矿工起义等。这些斗争和起义虽然很快地被清政府武力镇压下去，但也预示着一场巨大的革命风暴即将来临。

不幸从一八五四年至一八五八年的五年，是贵州各族农民大起义总爆发的时期。这一时期是以独山杨元保领导的布依族农民起义军于一八五四年春举行起义，揭开了贵州各族农民大起义的序幕。此后，全省各地均爆发了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

在黔南地区先后有罗光明领导的上江农民起义，柳天成

领导的都匀苗族农民起义，潘名杰领导的贵定苗族农民起义，瓮安何得胜领导的号军起义，潘新简领导的荔波水族农民起义等。

在黔东南地区有张秀眉领导的苗族农民起义，姜映芳领导的侗族农民起义。

在黔北地区有杨龙喜、舒裁缝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刘义顺、朱明月领导的白号起义军。

在黔东地区先后有以徐杰、梅济鼎、包茅仙为首的红号起义军。

在黔西南地区有张凌翔、马阿图、金万照领导的回族农民军。涂令恒、李林春领导的农民军。

在黔西北有陶新春领导的苗族起义军和王三巴扎领导的农民起义军。

此外还有数十支人数较少的农民起义军。

一八六〇年至一八六三年，石达开领导的太平军入黔，与贵州各族起义军联合作战，把大起义推向了新高潮。

一八五六年下半年，太平天国发生内讧，翼王石达开被迫于一八五七年率十万太平军西征，经江西、浙江、湖南、广西，准备“假道黔境，以入蜀疆”建立根据地，以图挽救太平天国。一八六〇年一月，石达开派石镇吉到广西百色一带扩大队伍，准备入黔。但由于战斗失败，石镇吉不幸牺牲。

一八六〇年四月，石镇吉的部将曾广依从广西渡红水河进入贵州兴义，攻克归化（紫云）、关岭、广顺、定番（惠水）等县城，并联合何得胜、潘名杰领导的两支起义军围攻贵阳。

这时，入黔太平军发生内讧分裂，余诚义率一部分太平军经黔南地区返回广西南丹。一八六一年，余诚义又率部进入黔南，联合潘新简领导的水族起义军，攻克荔波县城，又转战于古州（榕江）、黎平一带。张遇恩则率另一部太平军向西，到达黔西、大定、毕节，与陶新春领导的苗族起义军联合，围攻毕节县城七十余天，张遇恩不幸牺牲。

一八六一年十二月，石达开亲率太平军从广西北部出发，沿桂、湘、川、黔边界向四川进军。一八六二年初，因渡江失利，于四月进入黔北的正安、桐梓，不久又转回四川。同年十月，石达开再次率部进入黔北的仁怀、桐梓、绥阳，打到遵义。不久，太平军又转战四川、云南。

当石达开率太平军“假道黔境，以入蜀疆”时，曾布置其部将李福猷、李文彩率部随后入川。一八六二年，石达开率部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时，李福猷、李文彩曾在四川叙永的横江与清军激战，以期分散清军兵力。后石达开部在大渡河全军覆没，李福猷遂率一部太平军到达毕节、威宁，又转黔东，进入湖南，又转江西。李文彩率领的一部太平军，则于一八六三年十月，从湖南返回贵州的黎平，一直转战于黔东和黔南，特别是与张秀眉领导的苗族起义军联合作战近十年。一八七二年，李文彩在思州（岑巩）英勇牺牲。太平军在贵州的革命活动至此结束。

一八六四年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太平军余部又与北方捻军联合坚持斗争，至一八六八年捻军亦被镇压，全国农民起义斗争转入低潮。这时，清王朝集中了湘、川、黔、滇、桂五省兵力来镇压贵州农民起义。一八七二年，清军与起义军在乌鸦坡决战，起义军许多重要将领壮烈战死，张秀眉被

俘，在长沙慷慨就义。贵州各族农民大起义至此失败。

张秀眉的部将李鸿基率部突围，转移到古州、丹江等地继续坚持抗清斗争，至一八七四年被内奸出卖，斗争失败。至此，咸同贵州各族农民大起义结束，前后共二十三年。

在二十三年的斗争中，农民起军建立了根据地十个以上，攻克全省十二个府中的八个府，十四个厅中的十二个厅，十三个州中的十二个州、三十四个县中的三十一个县。击毙清王朝文武官员六百余，其中有被吓死的云贵总督罗绕典，有兵败自杀的贵州提督孝顺，还有在战场击毙的提督赵德光、按察使黄润昌等。清王朝还曾以“剿办不力”的罪名，先后撤换贵州巡抚十人次，提督十六人。

贵州各族农民大起义给了清朝统治者以沉重的打击，迫使清王朝采取了一些缓和阶级矛盾的措施，如减免赋税，暂停兵粮、杂役等，同时动员外逃农民回乡生产，使农业生产有了一些恢复和发展。

(刘昕整理)

楊元保领导的独山布依族农民起义

一八五四年在独山爆发了一次布依族农民起义。起义队伍威震黔南，影响全省，揭开了太平天国革命时期贵州各族农民大起义的序幕。这次起义的组织者、领导者就是独山上司播让村的布依族农民杨元保。

这次布依族农民起义，是清朝反动政府在布依族地区实行残暴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的结果。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为了对外赔款，对内镇压各族人民的反抗，更加残酷的压迫、剥削各族人民。各族农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独山布依族农民当然不能例外。

一是土司、流官的残酷统治。

独山土司除了通过劳役地租和实物地租对农民进行剥削外，还横加苛征滥派：“一年四小派，三年一大派”；如果土司家今年娶了儿媳妇，老百姓则三年之内也不敢婚姻；倘若违反这个规定，就是犯罪，犯了罪，土司就要将他绑去杀了，杀人不算，还要死者家属交“玷刀银”。

流官对布依族农民的压迫和剥削也很严重。独山虽曾于明弘治年间，实行改土归流，但“土司仍专擅自恣，流官名曰抚绥，多同贅旒”（音归流，贅旒是实权旁落的意思）。流官统治较强的地方，大权仍一半掌握在土司手里，并没有改变布依族地区土司专政的实质。一般情况是：流官掌握府、厅、州、县的地方政权，土司掌握着基层政权；流官通过土目来搜刮民财，土目则依靠流官来维持其没落的世袭统

治地位。因此，流官的设置，只是在封建统治者的营垒里，又增加了一小撮吸血鬼，给人民头上又多架了一把刀。

二是土地掠尽无以为生。

清王朝为了巩固流官在民族地区的统治，又在要隘重地设置屯卫。借屯田养兵之名，强占各族农民的良田沃土。还以“叛苗”、“绝户”为名，霸占了起义农民的大量土地，全省约计几十万亩。

加之，封建地主、投机商人乘机深入民族地区，使用种种狡黠手段，残酷地榨取农民财物，比如，有的以金钱或实物，进行高利贷剥削；有的代替少数民族农民向官府交纳田粮，从中加倍索取，几年之后，代交者即以历年的州县粮单为凭据，将田地占为己有；还有的，为少数民族农民“包揽词讼，借与银两，皆以田地抵偿”当时贵州民族地区，当买各族农民田土的汉族地主、商人，竟有三万一千多户。

如此大肆强占、掠夺、兼併的结果，使大批农民失去了土地。迫于生计，各族农民只好向地主租种土地，承受着沉重的地租剥削，如佃种了土司的田土，除受地租剥削外，还要“岁上牛羊猪鸡以为年例、年租”。更不合理的是，许多农民的田土，虽然已出卖，但“差徭采买仍出于原户”。

三是各族**农民**还要承受着清政府的田粮征赋和各种苛捐杂税的沉重负担。诸如：①田赋，征收率竟为产量的三分之一。在收田粮的时候，又要受到踩戥踢斛、样盘零尖等等名目的敲榨。②折征，即将田赋粮改征现金。由于粮商从中剥削，往往以三、五斗粮才能交足一斗粮的折征钱数。③捐输，就是贵州的财政本来靠川、湘等省调剂援助，后来中断，清王朝命贵州增征“捐输”以自给，实际上 是增收田

赋。④厘金，即在各府、厅、州、县遍设税卡，每逢赶场，对所有小商品，小至零星货物，都要上税，名曰厘金。⑤采买，即衙门官吏需要粮米货物时，派差役到农村去采买。采买时以低价大斗、大秤进行盘剥已很惊人，有时甚至竟“入室搜寻，乘机窃取，分文不给，公开掠夺。”⑥劳役，即政府官吏过境、下乡，都要供役；有不到的，就折交二、三百文，否则就拘罚数倍。

沉重的封建剥削，榨干了各族农民的血液，牛马般的无偿劳役，压断了各族农民的脊骨。当时，摆在各族农民面前两条路：一条是“忍饥而死”；一条是“挺而走险”，争取生存。因此，瓮安、天柱、铜仁等地发生多次农民起义，但规模都小。一场波澜壮阔的各族农民大起义的序幕——独山杨元保领导并组织的布依族农民起义，就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于一八五四年首先举起了义旗，向反动统治者进行着猛烈的冲击。

杨元保发起、组织、领导起义的经过是这样的：

杨元保出身于独山上司播让村的一个布依族农民家庭。他为人正直，爱为穷人打抱不平，深受群众的爱戴和拥护，在上司一带颇有威望，因此遭地方乡绅们的嫉妒和怀恨。乡绅们曾向当时的地方政府提出控告，独山官吏也曾派州差陈荣捉拿杨元保，并趁机大肆掳掠布依族人民。在此情况下，杨元保便与余光裕、杨官佑、顾老岩、舒裁缝等进行秘密组织，参加了李源发领导的天地会，并组织斋教，用传播宗教信仰名义，到处进行革命宣传，发动群众进行反抗斗争。播让乡绅更加感到威胁，于是又一次向官府告发。杨元保巧施妙计，就与和他有过来往的独山袁吏目和黄教官二人密议，

由袁、黄二人力保，并“反贼州官诘责告变者”，迷惑了官府，延缓了统治者出兵对付杨元保，使元保有更多时间进行起义准备。一八五四年春，杨元保的父亲带头抗捐，被官吏逮捕投入监狱。由于酷刑残害，杨元保父亲死于狱中，民心大为不服，元保更是十分悲愤。此时，正值广西天地会农民军进入独山一带活动，借此机会，杨元保立即号召起义，广大群众纷纷响应，数日之内，以布依族农民为主，还有水族、苗族和汉族等农民和手工业者共数千人，组织起来了。其声势之大，震动了都匀、独山、荔波以至黔南整个地区。

从一八五四年（咸丰四年）二月二十七日起，杨元保等率领布依族农民由播让、拉旺、四寨和麻尾等处，向丰宁上司发起攻击，沿途打败了八寨游击杨金鳌。独山州牧王效虞得到这消息后，惊恐万分，急令各个关卡阻击。阻击的官军都被义军打得落花流水，闻风而逃。继而，他们又向贵州巡抚告急呼救，但无济于事。杨元保领导的义军乘势而进，攻打了都匀府的平舟司，打败了土司杨继宗，占据了通往广西、南丹、独山、罗斛、大塘等地的交通要道。这时，贵州巡抚蒋霨远惊惶失措，急忙调集各路营兵三、四千人，由古州镇总兵、台拱营参将彭长春，候补道承龄率领，向义军进攻，然均被义军打败。但是，由于义军毕竟力量单薄，不宜离乡远征，便又南下与广西义军汇合，攻下了荔波的羊奉里司，摆脱了大队清兵。三月十四日，杨元保又与陆阿贵等领导的独山起义军配合，并联合李亚狗领导的一支广西农民军，直抵独山城外的白虎坡，围攻独山州城。蒋霨远又急调贵东道都匀知府鹿丕宗、清江厅判韩超、督派副将彭寿、署守备王敦伦和八寨游击杨廷柱等率清兵与彭长春、承龄配

合，内外夹攻义军。义军寡不敌众，陆阿贵不幸阵亡。为了更好地打击敌人，义军暂时放弃了进攻独山城的计划，又退守到山洞丛杂、粮草丰富、群众基础较好的播让、拉旺一带建立根据地。可是，清军并没有放弃消灭这支义军的计划，彭寿率领清兵一直追到寨前，接连攻打几天，都没有得逞。这时，远在贵阳的贵州巡抚蒋霨远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又气急败坏地命令彭长春快速向义军进攻，妄图一举把义军全部歼灭。在此情况下，杨元保等义军首领经过研究后，出于战略上的需要，决定除留大部义军据守播让、拉旺等根据地以外，由杨元保亲率一支轻骑精干的队伍外出游击。为与广西义军取得联系，以增强力量，抵御清军，作为播让的后盾。他首先夺取了下司。清军听说杨元保已夺下司，慌忙地又把队伍拉到下司，把下司层层围困起来，并接连攻打数日，也以失败而告终。清军见势不妙，急忙又调兵遣将，将署参将英志部队调来，并联同韩超部队一齐暂时放下外围，转攻播让、拉旺根据地。由于播让、拉旺一带地形险要，义军据守在悬崖山坳，凭借人的勇敢和地势的优越，一次又一次地打退了清军若干次进攻。但是，清军不甘失败，又调集了大批人马，以几倍于义军的兵力，继续围攻播让、拉旺。战斗非常激烈，义军消耗很大，将领唐士达战死。四月十六日、十七两天，接连丢失了几处阵地。清军缩小了包围圈。十八日，敌将英志从董尼向义军包围。这时，义军情况十分紧张，杨元保不得不放弃下司，回军支援播让。谁知，清军早有准备，在杨元保回军途中，遇到知县徐河清、游击杨廷柱部队的阻击，义军无法回援播让，杨元保只好分兵到四寨等处，以游击方式与清军转战。这时，清军又不断

增多，形成了敌强我弱的局势，义军奋力战斗，伤亡很大。为了保存实力，以利再战，杨元保于是率领大部义军退出根据地，向广西南丹边境迂回。当清兵攻入播让山寨时，留守在山寨的义军和清军进行了激烈地战斗，敌千总任得贵丧心病狂地放起火来，使用火攻；顿时山寨一片大火，六十多名义军全部就义。清军占领播让以后，敌将英志立即派遣候云沂率领清军追击已撤退到汪笼的义军。在激战之中，杨元保的儿子杨亚三，不幸被敌军俘获。同时，荔波知县李琛，游击马清杰也带领清军在瑶化、瑶琴等处拦阻撤退的义军。义军将领李老椿为了掩护杨元保率领的义军继续撤退，向广西迂回，实现与广西义军联合的计划，以少数兵力与清军奋力冲杀。这时，广西义军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发兵从红水河而下，接应杨元保亲自率领的义军。但是，在途中却遇到罗斛州判刘升平、练总罗萍藩的阻拦，以致未能达到驰援的目的。杨元保在前无接应，后有追兵的情况下，只好且战且退，经过多次与官军交战，损失较大。当他带领为数不多的义军到达董尼时，又与英志所带的清兵相遇，进行了一场激烈地战斗。杨元保在这场战斗中负伤，但他们仍继续带领义军坚持斗争，终于进入了广西南丹州的昔里山，准备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再行出山，与清军作战。这时，贵州巡抚蒋霨远得知这一情况，奏请清王朝命令贵州、广西、调集大量清兵和地方团练，将昔里山团团围住，实行四面封锁。义军被围困在山上，情况十分艰难，外无救援，内无粮、弹补充，然而仍然继续战斗，一直坚持到底。直到四月二十二日弹尽粮绝时，昔里山才被清军占领，杨元保不幸被俘。由于杨元保的这次起义威震黔南，影响黔北，给清政府以沉重打

击，清政府十分恼怒，便将杨元保押解贵阳，并在五月十八日将他杀害。

杨元保领导的布依族农民起义，英勇战斗，可歌可泣，为贵州各族农民起义军树立了光辉榜样。杨元保领导的起义时间较短，并最后失败了，但对贵州各族农民大起义的影响却是很大的，意义也是深远的。

杨元保牺牲之后，独山布依族农民并未因此而放弃对清朝统治者的斗争。他们继续在起义领袖之一余光裕的领导下，在独山一带进行长期的游击斗争，牵制了贵州南部的官兵。后来，在全省各族农民大起义爆发后，又配合各地义军向清政府发动了猛烈攻击。

(邵宏春 整理)

柳天成领导的都匀苗族农民起义

柳天成领导的都匀苗族农民起义，是太平天国革命时期轰轰烈烈反清斗争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次起义从清咸丰五年（公之1855年）五月在坝固揭竿而起，到清同治十年（公元1871年）四月柳天成在王司内套被叛徒杀害为止，其间共经历了一十六年的英勇奋战。起义队伍在柳天成等革命将领的率领下，有力地配合太平天国的反清斗争；协同张秀眉领导的黔东南苗族农民起义军，刘义顺、何得胜领导的号军和各族农民起义军转战黔南各县，曾三次攻陷都匀府城，多次与各路义军攻克独山、荔波、麻哈（今麻江）、两次进逼贵阳，并于同治八年打败拥兵上万的贵州提督张文德，取得羊安之战的重大胜利。

柳天成领导的都匀苗族农民起义，曾一度动摇了清王朝在贵州的统治根基，甚至使远在北京的上层统治阶级也大为惊恐。最后，起义虽然失败了，柳天成也壮烈牺牲，但柳天成领导的苗族农民起义，正如中国封建社会里所有的农民革命运动一样，是斩不尽，杀不绝的；赤手空拳的各族农民用他们的鲜血乃至生命，有力地证明了被压迫和被剥削的人民是不可战胜的。毛泽东同志曾经提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一) 清末王朝对苗族农民的压迫和剥削

鸦片战争以后，清末统治阶级内外交困：既要偿付大量的赔款，向帝国主义委屈求全；又要扩充军备，疯狂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于是加紧了对贵州少数民族的压迫和剥削。这一时期，繁重的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各种名目的税饷使处于贫瘠山区、生活艰难的各族农民苦不堪言。在贵州，仅“抽厘助饷”一项，就压得劳动人民喘不过气来。据《清实录》记载：“黔省抽厘章程，名厘谷，实通省按粮按亩十取其一。”苗民卖菜，卖柴，卖草都要被抽取厘金。一些地方官吏还趁“抽厘助饷”之便，大肆巧取豪夺，搜罗私财，他们“于十一抽厘之外，私加至十之四五。”其中，也有些富裕的人家“以贿巧脱”，然后再把“巧脱”的这部分厘金追加到穷苦苗民身上，使各族农民被“搜刮殆尽”。对那些无力缴纳厘金、厘谷的苗民“即以刀割其鼻，用绳穿孔鱼贯游街示众。”（《贵州通志》）

清咸丰四年春，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影响下，布依族农民杨元保在独山领导起义，揭开了贵州各族人民反抗清王朝的序幕。同年十月，杨凤（杨龙喜）领导的起义在黔北继起呼应；尔后，以张秀眉领导的黔东南苗族农民起义；以灯花教教首刘义顺、何得胜领导的号军起义，罗光明领导的斋教军起义等各族农民起义军于咸丰五年纷纷起事，形成一股不可阻挡的革命洪流。清末统治者走投无路，不得不扩充地主武装势力，妄图利用地方豪强和土司的力量，扑灭方兴未艾的革命烈火。这一时期，咸丰皇帝曾下谕命都匀士绅、原陕西布政使陶廷杰“督办清江下游团练”。都匀知府鹿丕宗